江村北海（1713-1788），名绶，字君锡，号北海，通称传左卫门。其出身藩儒世家，长于诗文，是诗社赐杖唐的盟主。晚年在京都开设対梢馆，传授儒学。其著作有《日本诗史》五卷、《授业编》十卷、《北海诗钞》八卷、《北海文钞》三卷。

江村北海的《日本诗史》是日本第一部具有诗史性质的诗话著作。该书刊行于明和八年（1771年）。根据日本《国书总目录》，该书共五卷三册。唯一的写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。而版本则分别藏于国立国会图书馆、内阁文库、静嘉堂文库、庆应大学图书馆。其中，该书的活字本可见于《日本儒林丛书》第三册和《日本诗话丛书》第一册。尽管有这些版本，但是该书在刊行后就没有再版。

《日本诗史》起稿于明和三年（1766年），成稿于明和五年（1768年）。原本计划出版十卷，但因为经费原因，只出版了现存世的五卷。据江户狂歌三大家之一大田南畝（1749-1823）记载，天明八年一月三十日（1788年3月7日）在京都发生的特大火灾中，《日本诗史》的原版被烧毁。

现存的五卷中，卷一阐述了日本诗学变迁的概略，时间从白凤时代（654年-710年）到庆长末年（1614年）的朝廷文学。卷二在时间上与卷一相同，内容分为十二个部分，分别论述武士、医生、隐者、僧侣、闺阁等诗作。卷三记载了元和元年（1615年）之后的文学情况。所记载的作品以京畿之地为创作中心，另有日本其他地方的文学。卷四同样记载了元和元年以后的江户文艺，以林凤冈（1645-1732）、木下顺庵（1621-1699）及其门徒为代表的诗作为中心。卷五顺承着第三、第四卷对京畿以外地方文学的记载。全书的重点在卷三及以后，也就是元和年之后的文学。

《日本诗史》在日本汉诗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具体体现在：

一、它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日本诗学变迁的情况，是日本江户时期汉诗学的代表作品。

二、它注重总结元和元年（1615年）起，即丰臣氏灭亡，日本长时段和平状态开始之后的日本汉诗创作情况，保留了当时相当多的史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江村北海在《日本诗史》以外又有《日本诗选》十卷补遗一卷，共七册。其中采集书目157种，除了别集以外，还有以幕末新出版为主的各种总集；而收录的诗人数量高达520人，其中收录5首以上的有75人。

三、其中提到的“日中时距两百年”、“气运”等概念，同时观照了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系，以及日本汉诗自身的发展和演进逻辑，具有相当的视野。

目前国内学界对《日本诗史》的研究并不完全。其中，《论〈诗薮〉对〈日本诗史〉的影响》（文艺理论研究，2015年第35期）一文详实考察了江村北海《日本诗史》在形式、内容和诗歌审美方面对明代胡应麟《诗薮》的继承。

作者提出，《日本诗史》的特色之一，就是对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运用，呈现出《日本诗史》中对史学传统的自觉运用。此外，“气运”的诗学概念被江村北海用以解释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因。同时，“气运”也被用以论述汉诗的功能、中日两国古典诗传统的关系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重要问题。对《日本诗史》体例和“气运”说的分析，突出了《日本诗史》的诗史意识。

在诗史意识中，本文作者尤为强调江村北海提出的：日本汉诗发展与中国历代诗歌“二百年”的时间差的意义和对日本诗学界的影响。这是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命题，即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是两种不同历史时间中的产物。其中原因，固然有汉籍向域外传播和日本诗人阅读、接受汉籍之速度的影响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所隐含的前提是，日本汉诗自有其本体与演进逻辑。一些日本汉诗研究中的以中国古典诗歌为绝对参照系，单纯视日本汉诗为对中国古典诗歌模仿、接受的结果，实际上也是忽视了上述重要的前提。

如此，以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为构建日本汉诗史的前提，则会对另一个表述——“本土”产生影响。依照《近世东亚汉诗流变》一书的说法，近世汉诗人开始产生明确的本土意识，其创作也展现出鲜明的本土色彩（2）。可以认为，此处的“本土”指的是有别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实践。那么，近世以前的汉诗创作如何？以日本汉诗为例，既然其与中国古典诗歌根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，那么“本土”的时间和文脉显然是自日本汉诗发生起就存在，“本土意识”、“本土色彩”也并不是凭空出现和明确的。对“本土”的重新思考，或许可以为日本汉诗史的书写，特别是对早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提供新的标准。

此外，格律声调的审美标准、风雅和日本传统“哀”美学的融合，对《日本诗史》这些方面的论述，则提示出日本汉诗史建构中的审美价值和经典选本的问题。什么风格的诗作能够代表日本汉诗的整体风格？江村北海的答案是：深郁厚笃、委婉细腻。那么，新的汉诗史的建构即要在更长的历史区间内作出新的解释。